

边城民族志

一个湘渝黔边界的集镇调查

BIANCHENG MINZUZHI

周大鸣 程瑜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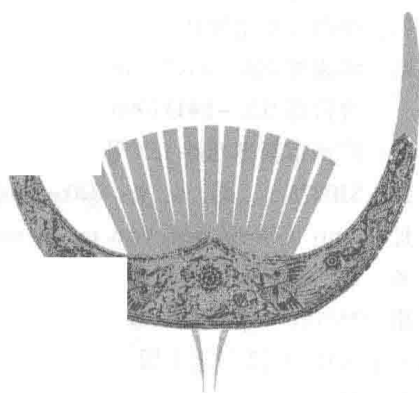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边城民族志

一个湘渝黔边界的集镇调查

BIANCHENG MINZUZHI

周大鸣 程瑜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城民族志：一个湘渝黔边界的集镇调查/周大鸣，程瑜主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 - 7 - 306 - 06452 - 3

I. ①边… II. ①周… ②程… III. ①民族志—花垣县 ②民族志—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IV. ①K280.644 ②K280.7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950 号

出 版 人：王天琪

策划编辑：嵇春霞

责任编辑：罗雪梅 王延红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张红艳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4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19 印张 360 千字

版次印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总 论

第一章 研究概述	3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11

第一编 茶峒镇

第三章 茶峒镇宗教信仰概况	21
第四章 民风民俗调查	44
第五章 “神药两解” 探究	60
第六章 旅游对经济的影响	68
第七章 土家族和苗族教育调查	83
第八章 社会组织调查	98
第九章 建筑文化及保护调查	112

第二编 洪安镇

第十章 法律、权威与地方性 ——洪安镇个案的法律人类学解读	135
第十一章 宗教信仰概况	148
第十二章 旅游发展调查	158
第十三章 留守儿童问题调查	174
第十四章 扶贫现状调查	194
第十五章 社会经济调查	208

第十六章 医疗健康调查	226
-------------------	-----

第三编 综合研究

第十七章 武陵山区三县经济社会发展比较 ——以湖南花垣、贵州松桃、重庆秀山的政策为例	237
---	-----

第十八章 茶峒、洪安妇女生活调查	248
------------------------	-----

第十九章 茶峒、洪安留守妇女和老人的调查	264
----------------------------	-----

结 语

第二十章 行政之边缘，文化之中心	279
------------------------	-----

参考文献	290
------------	-----

后 记	299
-----------	-----

总 论

第一章 研究概述

一、研究经过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基石。20 世纪 20 年代，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至此，田野调查真正意义上成为人类学的看家本领。从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反思日渐深入，方法日益多元。对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田野调查是其成年礼和进入人类学学科殿堂的敲门砖，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尤其对于多数本科生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是大三暑假的田野实习。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直有实地调查的传统，学生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执着的学术研究精神，更体验了人生，进一步了解了社会。

本调查报告集是关于湘西茶峒镇和重庆洪安镇的调查与研究。两镇地处湖南、贵州和重庆三省（市）交界地带，主要生活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 3 个民族。本次调查涉及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家庭、宗教民俗、基础教育、旅游开发和扶贫工作等方面。

本调查报告集之所以取名为“边城民族志”，是因为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茶峒和洪安这一带人民的文化互动都十分频繁，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所指代的亦是这一片地区。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茶峒和洪安两地的人民都认可自己是边城人，对边城有着强烈的认同。从“边城民族志”这一名称，可以窥视跨越行政边界的族群文化互动与交融。

本调查报告集共五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交代研究概述、田野点概况等内容。第一编为茶峒镇，共七章，包括茶峒镇宗教信仰概况、民风民俗调查、“神药两解”探究、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土家族和苗族教育调查、社会组织调查、建筑文化及保护调查。第二编为洪安镇，共七章，包括法律、权威与地方性，宗教信仰概况，旅游发展调查，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扶贫现状调查，社会

经济调查，医疗健康调查。第三编为综合研究，共三章，包括武陵山区三县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茶峒、洪安妇女生活调查，茶峒、洪安留守妇女和老人的调查。最后是结语部分，提出本报告的核心观点——行政之边缘，文化之中心。

本次田野调查由周大鸣教授、程瑜教授带领 22 名同学前往地处贵州、湖南和重庆三省（市）交界地带的茶峒镇和洪安镇，田野调查历时一个月。同学们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各自围绕研究主题开展系统的田野调查，最后每人撰写三万字以上的田野调查报告。白天，同学们前往老乡家做访谈，晚上在住处整理调查笔记，撰写田野日记。通过一个月的系统训练，同学们对田野调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掌握了基本技能与方法。

在本次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茶峒镇和洪安镇的领导以及当地乡亲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调查期间，师生们与当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老师和同学们来说，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大家成了好朋友。

本次调查之所以选择湘西茶峒镇和重庆洪安镇作为田野点，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茶峒和洪安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以沈从文写的《边城》为典型；二是这里生活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对于研究族群的互动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这里属于湖南、重庆和贵州三省（市）交界地带，是行政边缘和文化中心田野研究的典型。

二、研究的意义

本次调查对湘西茶峒镇和重庆洪安镇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有：首先，本次田野调查选在茶峒镇和洪安镇，对于研究苗族、土家族和汉族等多民族和谐相处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观点进行对话，了解新时代我国民族关系的新特点。其次，尽管沈从文的《边城》让湘西成为旅游胜地，但是学术界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再次，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边界之间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三省（市）交界的研究，因此本次调查有助于深化对族群理论的研究，例如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等。最后，在本次田野调查中，主要是围绕“行政之边缘，文化之中心”展开，这对进一步完善“中心—边缘”理论，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茶峒、洪安虽然地处三省（市）交界处，从行政和地理上均处于边缘地带，曾出现“三不管”现象，但是这里却汇聚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文化要素，它们相互之间不断进行文化互动和再生产，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人类学理论，掌握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与人交往的能力，对于学生的成长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茶峒和洪安等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存在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农村的发展现状，明确其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边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学术研究综述

（一）“中心—边缘”理论

区域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先驱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以及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ösch）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中心地理理论”；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第一次用“中心—边缘”的结构性概念来描述当时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峙情形，他认为“中心—边缘”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边缘”体系的三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中心—边缘”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中心—边缘”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心—边缘”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①

20世纪60年代末，“中心—边缘”概念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经过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包括“中心—边缘”关系、发达与欠发达、发展的前景三个方面的依附理论。其中，弗兰克等运用了普雷维什的分析思路，将其发展成“都市卫星”关系，也就是称“中心”为“都市”（Metropolis），称“边缘”为“卫星”（Satellite）。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是“都市”，发展中国家是“卫星”。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于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是“卫星”，相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农村是“卫星”。^②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中心—边缘”概念基础上增加了半边缘的概念，在空间上将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引申为“中心—半边缘—边缘”关系，认为

① 参见董国辉《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参见贾宝军、叶孟理、裴成荣《中心—边缘模型（CPM）研究述评》，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中心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通过不平等交换来完成的，这导致了边缘的不发达，世界体系的扩张导致外部地区的边缘化和不发达。中心地区的国家机器的功能之一是保证边缘地区国家机器的相对弱小和不平等交换的顺利进行。半边缘地区转移了部分政治压力，否则那些主要是处于边缘地区的集团有可能直接反对中心国家和那些利用中心国家机器对国内操纵的集团。半边缘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起中介作用。托马斯·香农（Thomas Shannon）截取了4个世界体系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比如1975—1983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是主要中心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苏联控制之下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次要中心国家，爱尔兰和西班牙处于中心和边缘的分界线上；半边缘包括中东、希腊、葡萄牙、南非、中南美洲的绝大部分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泰国；边缘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绝大部分、南亚、中国大陆、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少数地区。^①

在区域旅游规划方面，汪宇明认为“中心—边缘”理论提供了建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系统的认知模型。运用这种空间结构模型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景区土地利用功能配置与都会城市旅游圈层构造，以及促进区域旅游联动发展方面可取得满意的实践成果。“发展中心带动边缘”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中心地区要注意培育旅游中心区，形成旅游创新活动基地，带动边缘区域发展，壮大整个区域的旅游竞争力。^②

陈建军、姚先国在对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进行“中心—边缘”理论和“极化—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后，提出上海和浙江之间并不是“中心—边缘”关系的观点，认为增长极理论和“中心—边缘”理论这种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其主要经济社会特征是二元发展空间结构，而上海和浙江共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特征更为接近匀质条件。^③ 颜俊认为中国的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地理上的边远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计划体制的束缚、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以及人口问题等造成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形象地位和思想观念的边缘化，而边缘地区具有异质性、中介性、前沿性、公共性、关联性和层次性等特征，通过加成效应、协和效应等发挥边缘效

① 参见贾宝军、叶孟理、裴成荣《中心—边缘模型（CPM）研究述评》，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参见汪宇明《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载《经济地理》2002年第5期。

③ 参见陈建军、姚先国《论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一个关于“中心—边缘”理论和“极化—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3期。

应的作用,促进边缘地区的发展。^①

(二) 湘西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关于湘西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研究已不少,但是大多研究集中在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等方面,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专著则相对较少。与本研究有关的主要有:

1. 《文化人类学的湘西文本:土家族苗族历史文化研究》^②

本书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土家族、苗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状况,例如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创新,民族教育问题等。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历史沿革,具体包括土家族民族共同体及其族源、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积淀、民族史应为凝聚民族的同心圆、土家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乾嘉苗民起义的历史传说、清朝对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清朝“改土归流”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思考等内容。第二章则是风俗习惯,具体分为土家族传统节日及其祭祀、土家族端午节划“双舟”习俗、土家族婚妆与嫁妆、湘西少数民族婚俗考、土家族“贺生”“哭嫁”“歌丧”的哲理性等内容。第三章是土家族的宗教信仰,包括“五溪”之域有关龙的崇拜与生殖崇拜,湘西少数民族图腾神话,苗族神话、传说和故事里的“龙”,民族神话中的太阳神,巴楚崇火,湘西巫的传说与巫的故事,湘西祭司的特殊功能等内容。第四章讲民间文学,包括《九歌》原型考、《九歌》是土家先民生活的“天意”记录、《国殇》主题质疑、《竹枝词》的原型、《竹枝词》是土家族艺苑里的一朵奇葩、湘西土家族《竹枝词》选、湘西苗疆《竹枝词》选、苗族机智人物“老谎”等。第五章是民间艺术,分别讲述“三女戏”与“还傩愿”、土家族“哭嫁”与“哭嫁歌”、土家族情歌中的婚姻伦理观透视、土家族情歌抒情的艺术性、土家族打“挖土锣鼓”、土家族《梯玛神歌》、苗族舞蹈的历史价值、一首古老的土家族军葬战歌。最后一章则是讲教育治学,具体讲述清朝时期湘西的封建科举制、毛泽东的民族教育理论、“三维论证——多维操作法”的治学之道。

^① 参见颜俊《边缘效应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② 杨选民、杨昌鑫:《文化人类学的湘西文本:土家族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①

《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包括《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习俗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猪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文学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接龙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祭日月神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祭祀神辞汉译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还傩愿卷》《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上）》《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中）》《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下）》10部著作。湘西苗族“巴代雄”专用苗语进行祭祀的对象有大祖、元祖、寨祖、家祖、雷祖、龙祖、祖师、谷粟祖、日月神祖等。在以这条中轴线为主的范围内，又分有各个种类，光苗祀就有五十四堂之多。前几卷所载施、时姓“椎猪”及“接龙”，吴、龙、廖、石、麻等姓“椎牛”是苗教中之大祭祀。该书是石启贵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湘西苗族地区经多年调查整理出来的苗族传统文化集，8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些民族文化已濒临失传，所以这部著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参考价值。

3. 《湘西历史与文化》^②

该书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湘西土著居民历史与文化的源流、特质。湘西历史与文化是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书重点论述了湘西历史起源与沿革、湘西土家族苗族溯源、湘西封建政治与封建经济、湘西宗教文化等内容。

4.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③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我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一本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国内学术界研究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聚焦于湘西苗族文化的展示，通过实地摄影、图画素描、民间文物的搜集，甚至拍摄成影片，加上文字资料说明等，再现了当时湘西苗族社会文化的真实图景。对弘扬湘西苗族文化，加强苗汉之间及苗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全书分为十二章。第一章简单介绍苗族名称的递变。第二章则描述苗族的

① 石启贵编著：《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麻树兰、石建中整理译注，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② 熊晓辉、向东：《湘西历史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地理分布,提出区域的分布和垂直的分布。第三章介绍苗疆的人文地理,包括河流、地形、气候、聚落、房屋、道路等。第四章介绍苗族的经济生活,涵盖渔畜、工艺、贸易、饮食、服饰等方面。第五章则是讲述家庭及婚丧习俗。第六章讲述政治组织。第七章介绍苗人的屯田。第八至十二章分别研究巫术与宗教、鼓舞与游技、故事、歌谣、语言。

四、本调查报告具体章节作者

总论

陈世明

第一章 研究概述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第一编 茶峒镇

第三章 茶峒镇宗教信仰概况

杨云邕

第四章 民风民俗调查

冷雪卉 杨丹虹

第五章 “神药两解”探究

廖子宜

第六章 旅游对经济的影响

张莹 蒋锐

第七章 土家族和苗族教育调查

莫世琼

第八章 社会组织调查

李旸

第九章 建筑文化及保护调查

胡全

第二编 洪安镇

第十章 法律、权威与地方性

郑谦

——洪安镇个案的法律人类学解读

第十一章 宗教信仰概况

陈达理

第十二章 旅游发展调查

丁梦迪

第十三章 留守儿童问题调查

唐铎

第十四章 扶贫现状调查

秦华晨

第十五章 社会经济调查

张亚杰

第十六章 医疗健康调查

陈媛媛

第三编 综合研究

第十七章 武陵山区三县经济社会发展比较 邵 峰

——以湖南花垣、贵州松桃、重庆秀山的政策为例

第十八章 茶峒、洪安妇女生活调查 杨 洋

第十九章 茶峒、洪安留守妇女和老人的调查 毛晴心

结语

第二十章 行政之边缘，文化之中心 陈世明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本次田野调查的地点是茶峒镇和洪安镇，地处湖南、贵州和重庆三省（市）交界地带，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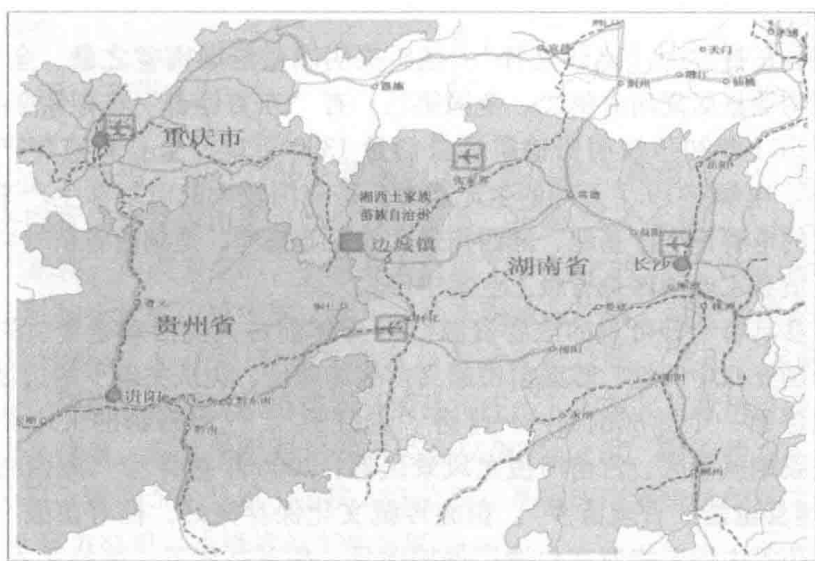


图 2-1 边城镇区位图

一、花垣县^①

花垣县位于湖南、贵州和重庆三省（市）接壤处的湖南西部边陲，自古以来有“西南门户”之称，地处武陵山脉中段，有“一脚踏三省”“湘楚西南门户”的称号。全县总面积 1109.35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74 平方公里（1995 年年末实有），含水田 101.2 平方公里，旱地 72.8 平方公里。东经 $109^{\circ}15' \sim 109^{\circ}38'$ ，北纬 $28^{\circ}10' \sim 28^{\circ}38'$ 。地势东南西三面高，北部低，中部缓呈

^① 资料来源：《花垣县志》、花垣县政府网等。

三级台阶状，最高海拔 1159 米，最低海拔 212 米。区域内年均气温为 $13^{\circ}\text{C} \sim 17^{\circ}\text{C}$ ，年降水量 1418 毫米，无霜期 245 $\sim$ 280 天。2016 年，全县管辖 12 个乡镇 217 个村 24 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31.47 万人，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黎族、畲族、高山族、水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羌族、塔吉克族、京族等民族分布，其中苗族人口占 77.3%。花垣县是革命老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苗族聚居县。国道 209、319 线贯穿全境，长渝高速、张花高速在此交汇。2012 年，全县 GDP 为 59.2 亿元，财税总收入 6.5 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 29.49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8.87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46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354 元。

花垣县还被称为“锰锌之都”。锰矿探明储量居湖南省之最、全国第二；铅锌矿探明储量居湖南省第二、全国第三，有“东方锰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2011 年初步探明铅锌矿远景储量 1300 万吨，全县具有年产电解锰 19.8 万吨、电解锌 19.7 万吨的生产能力，是全国较大的电解锰生产基地、湖南省较大的电解锌生产基地、湘西州最大的工业基地，是湖南省新材料自治州基地，花垣县工业园区是省级工业集中区。

花垣县具有十分可观的旅游资源：10 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址、朱镕基曾经求学的国立八中旧址、乾嘉苗民起义古战场遗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全球寒武纪地层第一个标准剖面——排碧“金钉子”、气势磅礴的大小龙洞瀑布群、边城茶峒风景区、古苗河蚩尤风景区等，2006 年被评为“湖南省文明县城”。花垣县也是“百里苗乡”。苗族传统文化保存完好，拥有苗鼓、苗族古歌、苗医药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拥有赶秋节、苗族武术、苗戏、椎牛祭、花带、接龙舞、司刀绺巾舞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跳仙、盾牌舞、开山舞、吃猪、傩戏、上刀梯、下火海、踩豆腐等苗族绝技艺术亦丰富多彩。花垣县是苗族巴岱艺术之乡、唢呐艺术之乡、苗山歌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苗绣织锦艺术之乡、全国蚩尤文化研究基地。

花垣县也是绿色环保的“生态基地”。全县森林覆盖率 47.9%，是中烟公司优质烟叶基地、桉木基地、线椒基地、大鲵人工繁育基地、湘西良种黄牛繁育基地、无公害富硒大豆和蔬菜生产基地、油茶基地，西伯利亚鲟鱼、兄弟河大闸蟹、乳鸽等特种养殖亮点纷呈，吉卫优质大米、排碧岩锣西瓜等特色农业品牌远近闻名，是全国农村饮水安全重点示范县、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县、国家蔬菜产业重点县、湖南省可持续发展试点县。花垣县建成了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边城高级中学，以及湘黔渝